

关于胡风生平考证二题

〔日本〕千野拓政 著

马蹄疾 译 陈曦钟 校订

译者前记：这里选译的有关胡风的两篇生平考证文章，涉及胡风1933年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后的两大历史史实。第一篇原题为《有关胡风资料两种》包括《关于胡风回国的时间》和《关于穆木天转向问题》两文，现先将《关于胡风回国的时间》译出，本文内容，不仅精确地考证胡风回国的时间问题，匡正了包括胡风本人在内的国内所有传记年表的谬误，而其价值远不只此，它对当时日本留学生被日方驱逐回国到上海的日程、人数及前后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这对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也不无参考之价值。胡风与《时事类编》的关系，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胡风未得彻底平反前，一直被视为胡风投靠国民党，甚至被诬为“内奸”的重大罪状，作者广征博引，认真考证所得出的结论是：《时事类编》虽由国民党给予经济资助，却是与国民党中央持对立态度的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其主要人士如史量才、陈彬和、左权、胡愈之、沈兹九、张仲实等，在当时不是被国民党暗杀，就是秘密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胡风在《时事类编》任翻译期间，接受了进步的文艺思想，对他形成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些考证，对进一步认识胡风有重大的价值。译文把原文后面的注解均插入正文，并作了适当删节和技术性处理。作者千野拓政先生，是日本茨城县流通经济大学专任讲师，为考证胡风史迹，曾多次来中国考察、调查，今年九月来访时，赐赠大作抽印本三种四篇，现先将上面二篇译出。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同志帮助，北京大学陈曦钟教授作了认真校订，在此一并深表感谢。

1990年12月20日

一、关于胡风回国的时间

关于胡风被日本警察逮捕强制遣送回国一事的前后经过据现在所知的资料，概述如下。

胡风在日本留学时期，成为日本共产党和普罗科学研究所的成员的同时，还在留学生中间发起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创办发行这个会的机关刊物《文化斗争》和《文化之光》，抨击日本侵略中国，宣传左翼思想。关于胡风在日本的活动，在此以前，近藤龙哉氏作过详细的调查，写成了《胡风研究札记（一）——关于他的理论形成期的传记的考察》，载1978年出版的《东洋文学研究所纪要》第七十五册。但是现在中国方面的新资

料陆续发表，笔者在国内也见到了若干新资料，可以更详细地追踪胡风的行迹，因此打算另文论述。1933年3月，胡风与二十四名中国留学生一起被日方以煽动“共产、反帝、反日等主义和思想”的罪名逮捕，经过几个月的拘留审查，他们被强迫退学遣送回国。（有关逮捕的记述，见昭和八年九月出版的《外事警察报》第134号杂讯栏的《关于帝都中国留学生的反日左倾运动》和1938年高山书院出版的《赤色支那》所载《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活动》两种资料。《外事警察报》无版权页，但在封底印有“内务省”字样，大概是内务省警保局编印的。《赤色支那》的作者是久保弘一，根据同书的记载，他是“陆军省新闻班陆军中佐”。）

关于胡风回国的情况，虽然已大致弄清，但回国的时间一直有六月（见《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三分册，胡风条，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和七月两种说法。根据胡风本人的回忆录，是七月上旬或七月初，现在中国持这个说法的已占多数（关于七月上旬的说法，见胡风《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二）》，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关于七月初的说法见胡风《我的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各种有关胡风的年表和传记大都因袭此说，见于年表方面的有张晓风编《胡风年表简编》，载《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4期；张大明、王保生《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大事记》，载《左联回忆录》（下），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见于传记方面的有鲍光前《胡风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1985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版。其根据都出自胡风的自述，胡风在《回忆参加左联前后（二）》（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三期）中说：

“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旬，我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回国。……大约两三日，在太平洋西餐馆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发言人中有周颖。我因为避免公开露面，没有说话。”

笔者在《归国后的胡风——关于左联时期胡风与周扬的关系》（载《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98号，1988年3月出版）一文开头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初，胡风踏上祖国的土地”这个说法，也是出于胡风的自述。现在对照各种资料，证明这种通行的说法，是与事实有矛盾的。

胡风自己写的《秋田雨雀印象记》（载1933年8月《文学》第一卷第二期），文章的末尾明明写着执笔的日期是“一九三三、六、三〇、病中”。如果按照胡风自己所说他是七月上旬回国，那么他的这篇文章应该在日本狱中所写的了。从当时胡风被拘留的情况来考虑，是有抵牾的。（从他所描写秋田的文章内容来考虑，也是如此的）另外从日本方面发现的资料《外事警察报》第134号是这样记载的：

“……根据六月七日内务省训第1505号内务大臣宣布将漆宪章以下二十二名留日学生遣返中国的命令，其中十七人于六月十二日分两次由东京站启程，于十三日由神户乘长崎丸起航出发，其他五人于同月十四日午

后七时三十分由东京站启程，于同月15日由神户乘箱根丸返回上海。”

在内务省这份命令中，所列被遣送者的名单里，有张光人（即胡风）的名字。

这样看来，胡风的七月份回国的说法，只有他本人这样说，是缺乏其他根据的。为了确定胡风回国的时间，还需要有另外的客观材料，因此，笔者从“开记者招待会”这一线索着眼，调查了当时的报纸中的有关记载，发现在上海发行的中国报纸《申报》1933年6月16日第12版“本市新闻”栏内，有这件事的记载说：

留日学生被迫归国（标题）

一行十七人昨日抵沪

拟日内招待中外记者

报告在日被追之详情

中央社云：我国留日学生习明伦、漆宪章、汪承漠、张光仁、徐文寿等十七人，于昨日下午五时三十分，被迫乘坐日船长崎丸轮抵沪，下轮后，即各自寻见寓所投宿，兹将其被迫经过及抵沪情形等分志如次

日探严密搜查

长崎丸靠泊汇山码头时，即有大批日探登轮，搜查返国之留日学生，手段异常严厉，比学生下轮搬行李时，日探仍在旁监视，一若汇山码头不在华土而在东京者，故当记者向返国学生探询时，均碍于种种，始终未吐只字，即返国学生名单，亦未曾详悉，足见当时情形矣。（被逐归国留日学生照片（徐天章摄）（略）

被迫经过情形

旋据返国学生某君乘间语中央记者，同人等十七人，于十三日夜分两批登长崎丸，离日返国，抵沪后，回忆在日被追情形，实令人悲愤交集，旅日留学生在九一八事件前，共有八千余人，旋即陆续返国，故现在留日者仅千名左右，本人等虽身在异域，迫于帝国主义淫威之下，但一念及日军进攻祖国，惨杀同胞，炮毁都市，未敢一刻忘怀，鉴于国内难民遍野，故有难民救济会之组织，期集款项，汇归祖国，稍尽国民之天职，不意致遭日方当局嫉妒，即于三月十五日起，密派警探，分向寓所，拘捕我等，据本人所

悉，先后被捕者当在四十人以上，但因分居各地，无从查询，本人等被捕后，即被拘于警署，倍受毒打，颇有因伤重而死者，且悉有一留学生，胸骨被打断，已送入司法机关。本人等释出后，即赴我国使馆求援，迭经交涉，一无结果，只得含憾返国，尚有学生三十余人，将乘下班轮返国云。

昨先到十七人

新声社云：此次被逐回国学生，原有二十二人，尚有五人留神户，须待今日由神户乘箱根丸续至，计明日亦有抵沪，昨日共到十七人，计：

徐文寿(工人)

苗景清(高师)

关中哲(工人)

宋明屏(明治)

黄钟铭(明治)

金礼先(不明)

胡祖承(不明)

周颖(早大)(译注：即聂绀弩夫人)

袁衣葛(研究)(译注：即聂绀弩)

汪承漠(医专)

汪景炎(明治)

张季长(高师)

张光仁(庆应)(译注：即胡风)等。系十三日自神户启行，因途中遇雾，故迟至昨日午后五时十分始到埠。

将向报界报告

返国学生等，昨因抵沪匆匆，未及将被迫情形详述，恐有劳中外人士之悬念，拟于日内，招待中外记者，详为报告一切云。

并且与此相呼应，在同一报纸二十一日的“本市新闻”栏中，报道了“第二批遣返留日学生”，“吴涵等六人”“已于昨日到达上海”的消息，上面引文中提到的张光仁当就是张光人(即胡风)，所以这些记载的内容，与前所述《外事警察报》的记载是一致的，由此可以考定，胡风回国的日期不是七月初，而是六月十五日。然而，其回国后的各种行动，和胡风的自述是基本相同的，这里在同月二十日的《申报》第九版“本市新闻”栏有关记者招待会的一则报道：

留日遣返学生

昨日招待新闻界人士

详述在日本被迫害虐待之全貌

被日本政府强行遣返之留日学生，组成抗日华侨归国团，于昨日午后二时，在四马路中央西菜馆招待新闻记者和各团体代表，报告被遣返经过。出席会议的有三十多人，先由主席周颖女士致词。继由漆宪章作被遣返经过的报告。……(中央社报道)

根据这则报道，记者招待会是十九日召开的，这个记载与胡风自述中的回忆情况基本上一致，但会场既不是在“太平洋西餐馆”，也不是在“广东同乡会”(此说见周健强著《聂绀弩传》，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是在四马路(福州路)的“中央西菜馆”。

根据以上的资料，胡风回国前后的动向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将它编成日程表的话，大概是这样：

六月七日，日本内务省发布训第1505号文件，命令胡风等二十二名留学生遣返回国。

同月十二日：胡风等十七人由东京乘火车出发往神户。

同月十三日：十七名乘长崎丸从神户启航，踏上归国之途。

同月十四日：剩余的五名由东京乘火车出发往神户。

同月十五日：胡风等十七人到达上海。

同月十九日：在福州路中央西菜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同月二十日：剩余五名(在《申报》上还包含一位叫袁周的女学生)到达上海。

同日三十日：胡风的《秋田雨雀印象记》脱稿。

(第二批从神户出发的留日学生，根据《外事警察报》是6月15日启航的，而到达上海的日期却是6月20日，这是个问题，只好待日后进一步调查研究了。)

自此以后，胡风于7月中旬决定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8月担任左联宣传部长，正式开始了他在本国的活动。

(原载日本法政大学教养部《纪要》第七十号(1989年2月)人文科学编)

二、胡风与《时事类编》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回国以后的胡风，一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发表翻译作品，同时又入左联领导机构担任宣传部长和行政书记等职，这期间他发表的文章不多，毫无疑问因为他的精力主要投入了《时事类编》和左联的事务。一年以后的一九三四年十月末（或十一月初）因为谣传胡风与国民党有关系，所以退出了左联领导机构。同时他也辞去了《时事类编》的职务。这个谣传不但左右了当时胡风的命运，而且成了解放后直至文革后给他恢复名誉之前批判胡风的一大罪状。

给他带来悲剧的谣传的根据，仅仅是因为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工作一事。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能否把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一事和与国民党有关系一事直接等同起来，这已经很清楚。但是胡风在这里工作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而在这里的工作不正是他在祖国活动的开始，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那末，中山文化教育馆是什么样的组织？《时事类编》是什么样的杂志？胡风在那里做了些什么工作？这些事情对胡风究竟意味着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无论对胡风的生平研究，还是对他的文艺思想的发展的考察，都是有必要的，现据笔者的调查所得，对中山文化教育馆及其《时事类编》和胡风在那里的活动，作一介绍。

（一）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活动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一个以“探究中山先生的主义和学说，为三民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建立基础，培育民族的生命精神，及在文化上永远纪念中山先生”（中山文化教育馆章程第二章总则第二条，见1934年出版《第一次教育年鉴》）为宗旨而创办的文化教育机构。它成立的经过，当时的馆长孙科（孙文的长子）是这样回忆的：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去上海旅行，当时和党的中上层的同志来往比较频繁，其间大家都感到有必要加强国家的基础，这不仅是实际的军事的政治力量方面，在文化方面也很有必要加强基础。原来中国的文化源流很长久，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到了总理（孙文——引用者）的三民主

义才集大成。从当前的形势看，我党的文化基础还很薄弱，马克思主义盛传一时，社会科学的书刊大多数受其影响。因而有识之士试图复兴三民主义文化，一致认为有必要加以发扬光大，于是提出了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组织的议案。（孙科《八十述略》台湾《传记文学》23卷5期1973年11月传记文学出版社）

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这个成立宗旨，是1931年11月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的《党义教育实施方法改进案》的延续，因此这个机构是由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联名发起的，财政的基础也是由国民党中央每月拨款五万元，还有上海市政府每年拨款五万元作资助。（见《申报》1933年3月12日“教育消息”栏）这样看来国民党对其活动是支持的，但是中山文化教育馆并不是国民党党内的组织。孙科接着阐述说：

本来总理的建国的方针并不是只对我党的指导，是全国人民的公共财产，按照常理，由政府或国民党出面来筹办这样一个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妥，但从当时国内的具体情况看，文化事业十之八九掌握在党外文化人士手中，一般的学生教员都错误地认为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经典，在这样的情势下，如果真由党和政府插手筹办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话，可能会招来更多的误解和麻烦，因此大家的意见，还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起，亮出民间学术组织的旗帜，这样就于翌年一月召开了发起人会议。

中山文化教育馆是有意识地与国民党分开的这样一个民间的文化教育机关，从其成员看都是与国民党中央取对立立场而与孙科亲近的一些人物，以及党外的民主人士，他们这些人占很重要的位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于1933年3月12日在首都南京的陵园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活动也就开始了。原来计划准备以南京为中心在各地建立分馆，但实际上在南京本部建成以前，已经在上海法租界福熙路八〇三号开始业务了。胡风在这个馆任职就是这个期间。这个馆迁移到南京的时间，是1935年2月20日（见《申报》1935年3月1日“教育消息”栏）。建馆（1933、3、12）的同时选出了以孙科为理事长的八名常务理事。

蔡元培 戴传贤 吴铁城 叶恭绰

史量才 郑洪年 孔祥熙 黎照寰

和二十九名理事(见《申报》1933年3月13日“教育消息”栏),以指导该馆的活动。常务理事召开了几次会议以后,决定了各业务部门的分工:

秘书长:叶恭绰

财务理事:叶恭绰 黎照寰

事务部主任:李大超,副主任:李庚

研究部主任:黎照寰,副主任:刘大钧

出版部主任:史量才,副主任:陈彬和

(见《申报》1933年3月13日“教育消息”栏)馆的职员包括理事总共有五十八名,其他还有若干从外面招聘来的研究员,调查专员及各业务人员。其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 学术研究(孙中山思想研究以及有关中国和现代各种重要问题的共同研究)

(2) 实地调查(往各地派遣调查小组,调查农村的社会经济、教育状况)

(3) 颁发学术奖金。

(4) 颁发奖学金(面向学生)

(5) 举办学术讲座(面向一般市民)

(6) 出版发行图书杂志。

(7) 设立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

以上各项业务,在1933年6月25日的常务理事会上通过了计划和预算,并开展了工作。这些工作从迁馆到南京,到抗日战争开始,转到武汉直到重庆郊外北碚至1942年都还继续进行。

当时担任《时事类编》编辑任务的是出版部,这个部门的具体工作是发行了下面各种杂志:

(1) 《时事类编》,先旬刊后改半月刊。发行至五卷十五期(一卷出十四期,二卷出二十八期,三、四卷出二十二期,1933年8月至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至1935年2月与中山文化教育馆一起迁移到南京。抗战爆发后改名《时事类编特刊》(月刊),共发行七十期(1937年9月—1942年1月)。发行地自1937年12月(六期)起转到汉口,1938年3月(十八期)起迁到重庆。内容主要译述外国杂志中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时事评论。

(2) 《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行至四卷三期(1934年8月—1937年4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后迁到南京。从政治经济到文学艺术,各方面内容都有大型杂志,每期发表论文约有二

十多篇。

(3) 《期刊索引》,月刊,发行至八卷四期(每卷出六期。1933年11月—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2月迁南京。是各种定期期刊的索引。

(4) 《日报索引月刊》,发行至七卷三期(1934年5月—1937年8月)。是各种报纸的索引。

(5) 《天下》,月刊,英文杂志,未详。

其它杂志在抗日战争开始相继停刊,而《时事类编》一直延续到1942年,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杂志在出版部占有重要的位置。与这相适应的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除胡风外,还有《申报·妇女园地》主编沈兹九,业已成名的胡愈之,和文学新人杂文家徐懋庸等。

负责《时事类编》编辑工作的这个出版部的内部是个什么情形?在出版部属下的《时事类编》又如何经营?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出版部的状况。

(二) 出版部的人事

刚才已经介绍出版部,是在主任史量才,副主任陈彬和领导下工作的。而实际上是谁掌握出版部活动,并和上层如何进行联系,关于这个内情,1934年中途进入《时事类编》的翻译,后来引起胡风辞职的种种谣言散布者韩侍桁曾有如下一段值得注意的回忆:

“中山文化教育馆本来是孙科派王昆仑去经营管理的,王昆仑又委托陈彬和搭了一个班子,沈兹九,胡风都在这个班子里头。”从他的回忆里,可以看出陈彬和在出版部起了很大作用的。他搭的这个班子,从《时事类编》的译者胡风、沈兹九等“都在这个班子里头”来看,显然就是出版部。

关于陈彬和,胡风在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时,孙科出钱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刚成立,陈彬和任出版部主任,出版《时事类编》半月刊,译载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时论(陈当时也是“民权保障大同盟”的活动人物,又是红色记者)。韩起(胡风回国后寄住的友人——引用者)的朋友杨幸之(湖南人)在那里当秘书,陈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杨幸之通过韩起拉我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为《时事类编》翻译文章。

陈彬和实际上是出版部副主任,但由于陈彬和一直实际掌握出版部的工作,所以别人看来还以为

他是主任，造成别人的误解。刚才引录的韩侍桁的一段回忆，提供了与上层有联系这件有趣的情况即：孙科派王昆仑去中山文化教育馆指导工作，王昆仑又通过陈彬和掌握出版部。

从当时的情况来考虑，孙科自己的确没有精力来领导中山文化教育馆，这也是事实。1931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这个大会上孙科的广东派与南京派的国民政府达成妥协)出任行政院长，但是不久由于蒋介石派从中作梗，孙科就任后一个月就不得不下野，后来孙科再度与蒋介石和解，于1932年12月任立法院院长，这一时期孙科最大的任务是负责起草宪法，因此远离首都南京的中山文化教育馆，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指导了。另一方面王昆仑是孙科任立法院院长时1935年的立法院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昆仑在重庆又是孙科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中掌握实权的人物，可见他和孙科关系密切。据《中国政党史》(宋春等编，1988年1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人物事典(一)》(郑福林编著，1988年5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书说，王昆仑是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总干事(两书中还介绍王昆仑在1933年已是共产党员)。但王昆仑在那里的任职日期并不明确，而且根据笔者的调查，馆成立当初的组织设施中并没有总干事这职称。根据上面的人事关系，回忆和资料记载等，毫无疑问王昆仑是孙科的心腹。他在孙科和中山文化教育馆之间确实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但是，当时王昆仑是否具体抓了该馆尤其是出版部的实际性工作，还是有疑问的。当时出版部主任史量才，众所周知是申报社社长。另外据《昭和八年版外国新闻(上卷)》(1933年外务省情报部编印)记载，当时陈彬和是史量才信任的申报馆副总主笔，而且实际上代替总主笔管着业务。陈彬和的秘书即介绍胡风到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杨幸之，也是《申报年鉴》的编辑，1933年1月《申报·自由谈》在主编黎烈文因妻子病逝请假的两周中，是由他代替编辑的，又据胡风《自传》、《时事类编》创刊当初的主编罗又玄是申报馆的副主笔兼经济部长。由此可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创立当初，出版部的工作实际上由申报馆来承担。这样一个事实说明，至少在出版部史量才的影响比王昆仑大得多，史量才发动申报馆的人参加工作，

出版部的实务工作，都由史量才信任的陈彬和来做。但是出版部的工作并非始终是由申报馆来经营的，据韩侍桁回忆说：

后来王昆仑不太受孙科的信任了，改为由钟天心和左恭担任，钟只是挂个名，实际上由左负责，左上任以后就创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回忆》)

当时没有固定职业的韩侍桁，是由于左恭的约请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任职的。关于左恭等接任出版部工作的情况，胡风在《自传》中有类似的叙述：

孙科已派钟天心来接替陈彬和的出版部主任，同来的有左恭(后来冯雪峰告诉我他是隐蔽的共产党员)和韩侍桁。

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的创刊时间(1934年8月15日)来看，他们进来的时间也就在同年的七八月份。其后好象陈彬和还在中山文化教育馆里，但他和申报馆对出版部的影响似乎降低了。同年十一月史量才的被暗杀无疑对这一趋势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事件的出现，使申报馆自身处于危机之中，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出版部的事情了。据陈彬和学生时代的朋友胡山源回忆，陈彬和在这事件后就离开了申报馆。(见胡山源《我所知道的陈彬和》载《人物》1985年第5期)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左恭到任后，申报馆的影响虽然削弱了，但各杂志的编辑力量没有恶化下去，例如《时事类编》杂志，在一度休刊(1934年8月)后，同年9月25日发行的一期(2卷22期)，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始了胡愈之的连载，关于文艺作品的介绍也增多了，这样毫无疑问比以前要精采得多，徐懋庸为这杂志撰稿，也正在这个时期。

然而，申报馆掌握出版部这一事实，不能不说有着深刻的意义。当时作为社长的史量才广泛地从事各种文化事业，他积极支持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是财界中有名的自由主义人士。正是由于是他主持工作，又加上友人的介绍，所以胡风对《时事类编》任职的事没有推辞。而且，如上所说，当时这个组织虽然有国民党的资助，但它是和国民党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教育团体。况且胡风在出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的事，曾向当时左联的领导作了报告：

我在书记处报告了这种情况，矛盾周扬

(当时的行政书记、组织部长——引用者)他们都主张我去。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于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任职而被谣传为与国民党有关系,因此不得不辞去在左联的领导职务,这从胡风来看,实在是毫无道理的。

胡风于1934年11月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职务,1935年2月该馆迁移到南京,其成员大多被更换了,与胡风关系比较密切的沈兹九、张仲实等人也同时离开了这个馆,胡愈之也和这个馆断绝了关系,同时申报馆对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的影响也彻底断绝了。

三、《时事类编》与胡风

《时事类编》这份杂志的具体内容怎样,胡风在这里干了些什么?这对胡风有什么影响?前面已经部分涉及这些问题,下面所说,则包括胡风任职期间的一些变化在内。

《时事类编》是1933年8月10日创刊的,开始为旬刊,胡风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两篇译作,至迟他是7月中开始在这里任职,包括出版部在内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各种工作计划得到确认,预算批下来的时候,是6月25日,可以说胡风从这个杂志开始准备创刊时参加工作了。

这个杂志的“编辑者”只标出“中山文化教育馆”。据胡风所说,编辑主任是罗又玄。每期大约有60页,发表论文十几篇。其内容“一,从各国著名杂志选译各种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重要文章;二,搜集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各种统计数字;三,介绍外国人士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问题的观察和批评。”(见各期《编辑凡例》)翻译的资料来源主要是英、法、德、俄、日各国的杂志,各种语言都有几名固定的翻译者,胡风是其中之一。其主要翻译人员名单如下:

英语:陈嶽生、陈问路、马润庠、严鸿瑶

王显廷、徐卓英、韩待衿。

法语:李万居、陈逸凡。

德语:潘惠田。

俄语:张仲实、吴清友、樊英。

日语:胡风、力生、沈兹九。

其中李万居、马润庠、潘惠田直到馆迁南京后,仍为编辑,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是钟天心。(见《时

事类编》3卷10期)他们的翻译,从胡风的译文来看,大概是全译,至少胡风的译文是这样,胡风的翻译大多是与政治经济有关的时事论文(参见文末所附目录)。所翻译的文章并非全都由自己选的,但是胡风所译的作品,有不少是为当时的世界危机敲警钟的,胡风还翻译了一些他留学日本时有过关系的普罗科学研究所发行的《普罗科学》、《读书》、《文化集团》和《唯物论研究》等左翼杂志上的文章。这些论文大概都是胡风自己选的。从所选的这些文章看,尽管当时胡风的读书倾向尚未确定,但仍可由此窥见他的思想正向何处发展。他翻译的论文篇幅都是比较长的,数量不多,而且都是在原杂志发表后很短时间就翻译过来,从中可以看到胡风惊人的精力和勤奋。也可以看出当时胡风读书速度之快和吸收能力之强。

当时胡风的译文,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体,他后来所写的文艺批评的那种独特的风格,在这时翻译文中已经显露出来。例如他把日本的用语,直接引入自己的文章,以及像日语一样,多用“的”字。而且胡风独特地把“的”和“底”的用法区分开来,这从他翻译的中野正刚的论文中可以看出得很清楚。日语中用“~の”的场合用“底”,其他的场合用“的”以示区别。胡风独特的文体,无疑是在翻译中养成的。

前面所说的《时事类编》的编辑体制,持续到1934年夏天,8月15日发行的第2卷21期上发表了一则“本刊启事”,其中说:“本刊……一周年纪念特大号发行以后,准备休刊一个月,至9月10日继续出版,计划对本刊的内容作改革和充实。”对杂志社作了大幅度的改组。这是左恭等刚到出版部时的事。他创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并亲自编辑,从这事来分析,这杂志的改革和人事的变动无疑是有很大关系的。

果真在9月25日发行的22期《时事类编》面貌一新,每期扩大到一百页,论文也增加到十五篇左右,而且开辟了“世界论坛”“学术论著”“时事漫画”“人物评传”“文艺”等栏目,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文化方面也增强了,内容比过去丰富多采得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愈之的一月一次的解释世界形势的“×月的世界政治”栏目。这件事在本期的《编后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特

请胡愈之先生长期担任这个专栏的撰稿”(而实际上这个专栏,自馆迁移到南京后,只连载了三期就中断)。

胡愈之参加《时事类编》的执笔一事,具有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他通过邹韬奋同生活书店有很深的关系,胡风的友人张仲实于1935年2月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职务后,就是由胡愈之的介绍到生活书店任编辑的,1936年胡风的最早一本评论集《文学与生活》是由张仲实编辑并在生活书店出版的(后来作为胡愈之夫人的沈兹九也从中山文化教育馆辞职后,到生活书店任《妇女生活》的主编。这虽然不知是否与胡愈之有关,但是他们二人的初次见面可能就在中山文化教育馆)。

胡风辞去中山文化教育馆职务以后,专心于写作,他的登上文坛与许多人物有关,其中特别不能忘记的有鲁迅与黄源。但是如张仲实那样的《时事类编》一圈子,对此也起了作用。假设胡愈之没有加入《时事类编》这项工作,张仲实与胡愈之也没有什么关系,对胡风也不大了解的话,情况那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吧。

从胡风文艺理论的发展来考虑,胡风与张仲实也有一段不解的因缘的。张仲实的《时事类编》2卷21—22两期上,连续发表了苏联文学顾问会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在3卷4期上发表了法捷耶夫的《我的创作经验》的翻译,后来出了单行本,胡风写了《形象的思考》这篇书评,给予介绍。张仲实翻译的文章,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中对充满“政治的杂音”那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以议论来代替表现”的那种哲理小说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文艺作品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的,不仅仅是建立在理智上的”。对于这一点,胡风概括为: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的思想、观念和所要表现的对象之间存在化学融合作用影响,作者思想和观念要不断接受所要表现的对象给自己的观念和思想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改变,从而加深对所要表现的对象的认识,这样所要表现的对象,才是活生生的形象,这样的思考(=形象的思考)才是艺术家的本领。

在这一阶段,胡风对这一概念还只是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能力来把握的,但这对胡风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

念,即“形象的思维”。胡风当然注意到张仲实在《时事类编》发表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可说胡风的一部分文艺理论在《时事类编》任职时期,就初步形成了。

以上事实证明,作为文艺批评家的胡风的某些方面是在《时事类编》的活动中,以及在和杂志同人的交往中形成的。我们所看到的《时事类编》时期的胡风处在摇篮期的左翼文学青年这样一个形象。他本人在独自前进中遇到了巨大的考验。对当时贫苦的生活,胡风这样写道:

“我就当上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的日文翻译,给每期《时事类编》译一至二篇文章。我提出只上半天班,他们(指陈彬和——引用者)也答应了。但我的工资是翻译人员中最少,只一百元。”

实际上刚从日本归来的无名青年(当时他才31岁),这样的条件并不算很坏,因为他当时生活还没有着落,每天只上半天班,对懂得日语而且又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来说,对自己的能力和理想来说至少是一个满足。胡风上面这段话,应该说对自身的能力抱有太大的自负了,而事实上,胡风的精力确惊人,当时他既要搞翻译,又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

这一年(1933年)12月胡风和梅志结婚,婚后一个月夫人就怀孕了,本来是应该庆贺的事,但他在《自传》中却是这样说的:

“我怕生活上拖不起(不仅是经济上,还有时间和精力上),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就让她去打胎。”

但最初用的药失败了,后来由鲁迅介绍到一个日本人开的医院去动手术,也没有成功,叫休息一天再去,胡风看到动手术的情况觉得太残酷了,只好不去。这种情况当然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幸福可言。

左联的工作,新婚的家庭,为此而去《时事类编》工作,妻子的怀孕与打胎,可以想见胡风这时的处境是多么艰难。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下,胡风使他自己逐步成长为一个文艺批评家。

这样看来,给予他保护和信赖的鲁迅,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重要的人。然则,对于冷漠地默认对他来说是毫无根据的谣言,并迫使他辞去左联领导职务的周扬等人,胡风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

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附：《时事类编》所载胡风翻译篇目

世界经济会议呢？“不”经济会议呢？

署名：果。作者：林要。载1卷1期（1933年8月10日）

明年度的日本预算——增税与赤字公债——

署名：果。作者：笹原正志。载1卷1期（1933年8月10日）

现世界的日英经济战

署名：果。作者：高木友三郎。载1卷2期（1933年8月21日）

苏维埃联邦远东政策底转变

署名：果。作者：冈田宗司。载1卷2期（1933年8月21日）

从贸易上看到的日美关系

署名：果。作者：松冈正男。载1卷3期（1933年9月1日）

苏维埃联邦远东政策底转变(续)

署名：果。作者：冈田宗司。载1卷3期（1933年9月1日）

国际石油战线的展望

署名：果。作者：水伺幸之助。载1卷4期（1933年9月11日）

国际石油战线的展望(续)

署名：果。作者：水伺幸之助。载1卷5期（1933年9月21日）

日英经济战的尖锐化 夸耀于世界产业界的日本纺纱业的威力

署名：果。作者：深泽甲子男。载1卷6期（1933年10月1日）

美国陆军的现状

署名：果。作者：佐藤贤了。载1卷6期（1933年10月1日）

广田外长就任的原委

署名：果。作者：野村秀雄。载1卷7期（1933年10月11日）

从国防上所看到的日本海交通

署名：果。作者：关根郡平。载1卷8期（1933年10月21日）

对于日本国策协定的检讨

署名：果。作者：中野正刚。载1卷10期

（1933年11月11日）

苏联领袖对于苏联国防的意见

署名：果。作者：奈西(音译)。载1卷11期（1933年11月21日）

一九三六年的战略论——以和苏联的关连为主

署名：张果。作者：平田晋策。载1卷12期（1933年12月1日）

五长会议底结束与政局

署名：张果。作者：奈西(音译)。载1卷13期（1933年12月11日）

日满贸易的现状

署名：张果。作者：奈西(音译)。载1卷13期（1933年12月11日）

日本金融资本底特殊性

署名：张果。作者：佐多忠隆。载1卷14期（1933年12月21日）

和平的准备

署名：张果。作者：横田喜三郎。载2卷1期（1934年1月1日）

日本主义哲学的批判——纪平正义哲学底真相

署名：张果。作者：广濑进一郎。载2卷1期（1934年1月1日）

日本一九三四年度的预算批判

署名：张果。作者：阿部贤一。载2卷2期（1934年1月21日）

国防的基础概念与1936年的海上

署名：张果。作者：伊藤正德。载2卷3期（1934年2月1日）

从日印会议里面所看到的日本资本主义底特殊性

署名：张果。作者：林要。载2卷4期（1934年2月11日）

罗斯福底非常时对策

署名：张果。作者：阿部勇。载2卷5期（1934年2月21日）

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

署名：张果。作者：永田广志。载2卷6期（1934年3月1日）

世界军需工业底概况

署名：张果。作者：奈西(音译)。载2卷7期（1934年3月11日）

法国底暴动与政变

署名：张果。作者：町田粹楼。载2卷9期

(1934年4月1日)

太平洋英国海军会议

署名: 张果。作者: 矾藤太。载2卷9期

(1934年4月1日)

日本为什么害怕苏联

署名: 张果。作者: 长冈克晓。载2卷10期

(1934年4月11日)

日本右翼改造运动向那里去

署名: 张果。作者: 山川均。载2卷11期

(1934年4月21日)

广田外长论

署名: 张果。作者: 马场恒吾。载2卷13期

(1934年5月11日)

“日本主义”思想之高涨

署名: 张果。作者: 坂本三善。载2卷13期

(1934年5月11日)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问题

署名: 张果。作者: 水城忍。载2卷13期

(1934年5月11日)

日本资本主义向那里转变?

署名: 张果。作者: 石滨知行。载2卷14期

(1934年5月21日)

菲律宾独立与日本

署名: 张果。作者: 关根郡平。载2卷15期

(1934年6月1日)

苏联批评家所看到的日本财政

署名: 张果。作者: 阿·若捷(音译)。载2

卷16期(1934年6月11日)

日本经济飞跃底真因

署名: 张果。作者: 高桥龟吉。载2卷17期

(1934年6月21日)

军缩会议之前哨战

署名: 张果。作者: 伊藤正德。载2卷19期

〔上接222页〕

这样的想法中结成“兄妹”、无论如何也要“深刻地生活下去”的情况。这里所说的“深刻的生活”，在田汉看来最终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联系的。他的这种构想是在与新人会的接触中孕育而成的。不过，此时田汉的思想上并不具有社会变革的远景。在他的心目中，一方面是彻底地否定“微温的生活”、抱着“身边有一股冷风”的紧张感；另一方面是梦寐以求新中国到来而生活着的

(1934年7月11日)

满洲农业移民问题

署名: 张果。作者: 矢岛淳次郎。载2卷19

期(1934年7月11日)

满洲景气底畸形性

署名: 张果。作者: 小泉吉雄。载2卷20期

(1934年7月21日)

动乱漩涡中的德国

署名: 张果。作者: 益田丰彦。载2卷21期

(1934年8月5日)

勒觉尔金(短篇小说)

署名: 张果。作者: 夏蒲利洛维奇(音译)。

载2卷22期(1934年9月25日)

军国日本底经济的容貌

署名: 张果。作者: 石滨知行。载2卷23期

(1934年10月10日)

陶烈教授底业绩——故广东中山大学教授陶烈

署名: 张果。作者: 铃木直吉。载2卷24期

(1934年10月25日)

现代法国文学底转机

署名: 张果。作者: 小松清。载2卷24期

(1934年10月25日)

苏联的宗教问题

署名: 张果。作者: 永田广志。载2卷26期

(1934年11月25日)

作为农民战争的太平天国革命

署名: 张果。作者: 佐野袈裟美。载2卷28

期(1934年12月25日)

现代知识阶级底困惑

署名: 张果。作者: 大森义太郎。载3卷1

期(1935年1月10日)

〔原载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编印

《中国文学研究》第14期(1988年12月)〕

青年自身的姿态和生活方式。也就是他所主张的，这个时代的青年们只有在相互联系、相互团结和“真挚”地生活下去之中，才能发现中国的活路和创造道路。田汉说：“一诚可以救万恶”。所谓“诚”本来是一种条件和姿态，而不可能是终极的目标。但是，我认为这句话正说明了田汉这个时期的梦与期待。

〔原载《近代文学における中国と日本》一书，汲古书院1986年10月出版。〕